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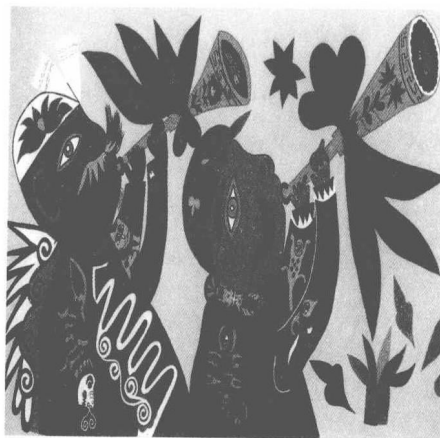
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

——现代作家的农民观与农民形象嬗变研究

张丽军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一般项目



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现代作家的农民观与农民形象嬗变研究/张丽军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ISBN 978-7-5426-3119-0

I. 乡… II. 张… III. 乡土文学—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5781 号

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

——现代作家的农民观与农民形象嬗变研究

著 者/张丽军

责任编辑/钱震华

特约编辑/黎 迦

装帧设计/鲁继德

责任校对/田 波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江苏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400 千字

印 张/20

ISBN 978-7-5426-3119-0

I·438 定价:40.00 元

序言：以乡土中国作为方法的文学研究

吴义勤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曾经繁荣一时的乡土文学创作与研究陷入了低潮，乃至一些评论家认为新世纪文学和乡村、农民有了一道厚重的坚冰，钱理群先生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呼吁要重建文学和乡土的血肉联系。在这样时代文化语境下，作为一位从乡土中国农村长大的研究者，张丽军博士其博士论文关注的就是“农民叙事问题”，而博士毕业到山东师范大学工作并师从本人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以来，更是自觉选择中国现代文学数量最大的农民形象群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仔细分析现代作家农民观的同时，勾勒现代文学农民形象精神嬗变的心灵图景，力图探寻乡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涵，以寻绎出一条乡土中国农民走向全面解放的现代道路。《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一书就是这一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其独特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追求令人称道。

1948年费孝通先生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第一次详细阐述了乡土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伦理、秩序、社会结构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乡土中国独特的“差序格局”生存思维。张丽军博士认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阐释，在21世纪的新世纪中国依然不过时，依然是解读中国的一把有效钥匙。因此，在美国学者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和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的理论、方法的启示

下,张丽军博士认为,“对于中国历史,只有置于中国历史和文化自身的语境中才能得以理解,中国本身就是一种视角,就是一种方法。即应该用中国本身历史和事实来研究中国,从中国内部的历史事实出发,探究中国现代化的内部原因、内在动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乡土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方法,一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性思维理念。所以,就全书而言,张丽军博士打破了以往仅仅从“地方色”视域上的“乡土文学”研究格局和研究方式,紧紧抓住“乡土中国”和“现代性变迁”这一时间和空间的独特结合体——现代化视域下的乡土中国,来研究这一独特时空结合体下的农民形象群。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研究真正凸现了乡土中国的文学现代性特质。

正是在这样一种“乡土中国文学”的研究理念下,张丽军对现代文学思潮、作家农民观以及作品中的农民形象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被以往启蒙、革命、大众、集体等巨大词汇所遮蔽的新问题与新观点。《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一书从晚清改良文化思潮开始探源,在分析严复的“三民说”和梁启超的“新民说”内涵基础上,仔细考察史料文献,提出白话文运动的农民大众“接受指向”的新观点:随着人们对小说的“新民”、救国功用的认同,扩展小说受众群体的需要越来越迫切,要求语言进行变革、与“负贩之流、市井之徒”的农民大众进行对接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变革赋予语言变革一种极为重要而迫切的地位,白话文运动不仅在于体现了语言形式的变革,而且在于它成为了传播新文化的载体,使文学走向了大众,缩短了大众与各种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距离,为提高普通大众综合素质、推进农民素质的现代化、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变革,提供了一道便捷舒畅的桥梁。用农民大众的语言来说农民大众,为现代文学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受众群体建立了一条精神沟通的语言渠道,使梁启超的以小说来“新民”的文学启蒙道路得以畅通,大大便利了现代意识进入农民大众群体的语言渠道,打通了一条知识分子与农民、现代文学与乡土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

在“五四”文化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思潮、“劳工神圣”思潮以及歌谣运动与现代文学中的农民想象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成为现代作

家对农民进行审美想象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背景。刘半农这一时期创作的具有强烈平民倾向的“新悯农诗”代表了这一时期现代作家的乡土中国情怀。《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审视与思考，如分析鲁迅的农民观及其农民想象的时候，作者一方面揭示出鲁迅农民观的深刻内涵，也不讳言鲁迅想象农民的盲点所在，即以启蒙的思想视野来审视中国农民，通过塑造愚昧麻木的“中国病人”来揭示“病中国”的思想症候，显现了一种“深刻的偏见”，但也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愚昧病态的文学审美想象模式和思想偏见。作者通过对《社戏》、《故乡》进行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出了鲁迅想象中国农民的另一种思维模式，即“田园乐土”式的纯朴农民形象，指出其开创的乡土抒情小说模式。这一批判性思考可以说是贯穿全书，如对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形象的分析，指出翠翠形象内涵的双重性；如分析赵树理农民文学，指出其作品所阐述的新中国乡村政治生态的精神内涵和启迪新世纪文学的艺术生命力。

《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不仅对现代文学作家的农民观及其塑造的农民形象进行个体分析，而且还通过对各个时期典型的农民形象的分析，整体性展现了农民从麻木、觉醒、挣扎与抗争逐渐走向追寻解放，成为农民英雄的精神嬗变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付出的精神代价与迷失。张丽军博士认为解放区农民翻身解放形象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同时，也要区分农民翻身的性质、追问究竟是主动式翻身还是被动式翻身，指出被动式翻身的主体精神缺陷，以及重新陷入精神病态与物质贫困的可能性。农村女性如何觉醒、反抗、翻身，乃至成为英雄，是作者特别关注的问题。该书最后一章“从被侮辱被损害者到革命英雄：女性农民形象的审美嬗变”以解读典型女性农民形象的方式，结合当前最新研究成果，对复杂语境下女性农民解放的问题进行了多维度分析，显现了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

很可贵的是，张丽军博士在分析乡土中国现代化思潮对作家农民观及其农民形象的影响时候，没有拘泥于已有的文学史料，而是重新深入时代历史语境，对当时一些影响较大的刊物杂志如《新青年》、《中国农民》等，进行史料挖掘工作，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通过翔实的

事例和数据再现了乡土中国独特的现代性语境,为文本分析奠定了坚实史料基础。

张丽军博士是一位对于学术有着执着追求的青年学者,他肯吃苦,敢于挑战权威,对新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前沿理论有着广泛的涉猎与钻研,显示了旺盛的学术活力。其新著《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一书的一些观点也许需要商榷或进一步思考,一些史料可以挖掘得更深透、丰富,一些典型作家的农民观可以进一步展开论述,但是作者对乡土中国现代性的独特理解、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现代文学农民形象精神嬗变的探索,是非常可贵和富有学术价值的,必将为关注乡土中国现代化、现代文学农民形象和中国农民命运的读者所重视和喜欢。

是为序。

2009年7月31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导 言

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这都是西方现代性所无法回答的“中国问题”。

现代西方汉学对中国现代化研究是“刺激—反应”思维模式，以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与内涵为参照，来比照中国的现代化。这种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化”成为印证西方现代性的他者，是以西方现代性的普世性对中国独特现代性的遮蔽，遮蔽的恰恰是中国现代性所独具的特征。因而，这种“中国现代性”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也无法真正理解和阐释事实存在的许多“中国问题”。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已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抛弃了“刺激—反应”的被动性研究，不再以西方的现代化来剪裁中国现代化，而是回到中国历史本身，从中国历史的丰富细节中寻找中国现代化特质因子。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中国史研究中，十分注重探索和讨论“作为方法的中国”。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文译本名为《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国人民大学 1996 年版）提出的核心概念就是“中国基体论”。所谓“中国基体”，是指“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历史情况及其发展规律，这种发展规律可以从其长期绵延不断的各种丰富的历史演变中窥测到，因此中国的近代应该是可以与前近代的关联角度上把握的。”（P184）对于中国历史，只有置于中国历史和文化自身的语境中才能得以理解，中国本身就是一种视角，就是一种方法。即应该用中国本身历史和事实来研究中国，从中国内部的历史事实出

发,探究中国现代化的内部原因、内在动力。

作为“小说中国”形态存在的中国现代文学,以审美的方式对农民这一中国革命历史主体进行了想象性叙述,塑造了类型众多、形态各异的农民形象,直接参与了中国现代化的建立与发展,即以审美的方式来想象与建构了一个由众多“农民形象”所组成的“乡土中国”。由于中国农民占乡土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主体地位,乡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所构成的丰富社会生活内容在通过文学来表现的时候,都无法绕开农民,都充满了对农民的想象与建构。从1917年新文学发端直到解放后,农民形象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庞大的形象群体。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庞大形象群体的农民形象,就成为进入探究乡土中国现代化、现代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路径。“农民形象”就成为考察乡土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维度。简而言之,最庞大的农民形象群本身就是乡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表征,一个迥异于西方的、独异的文学现代性。

本书选择农民形象作为研究乡土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切入点和基本单位,即以“乡土中国”作为视角与方法,力图从乡土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农民这一中心问题,透过中国现代作家审美想象与建构的农民形象,来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在多元历史文化思潮中对乡土中国和中国农民的思想认知、对乡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分析中国农民在乡土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形象变迁和思想意识的觉醒,进入乡土中国文学独异的现代性研究。事实上,现代文学众多色彩各异的农民形象就是乡土中国现代化审美叙事的中心内容、中国现代文学独具现代性的特色之一。乡土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农民、乡土中国文学与农民形象,具有一种相互映现的同构关系,具有一种互文性联系。

本书以晚清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为起点,展现“五四”各种现代文化思潮与乡土中国农民问题的精神联系,集中对国民性、白话文运动、劳工神圣运动、歌谣运动等思潮现象进行文化研究,来呈现各种现代思潮对“五四”新文学“农民问题”的美学审

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是极为深远的,现代文学都可以见到“五四”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子。启蒙思潮与鲁迅、文化人类学与沈从文、早期马克思主义与20年代后期农民运动思潮(如《中国农民》杂志的出现)、阶级现代性与革命文学、断裂的现代性(抗日救亡运动)与东北作家群、延安农民革命与“工农兵方向”的新意识形态、大众化运动与赵树理的农民文学、农民革命的成功与农民英雄传奇的文学书写等等,构成了本书主要的文化景观。

农民形象是现代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化的纽带与桥梁,是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主体的理想性建构和革命性改造,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理解与选择。农民形象不仅是乡土中国现代化探索道路上的艺术结晶,也是现代作家农民观的审美理念的感性形式。现代文学农民形象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乡土中国现代性”,是乡土中国在世界现代文化语境中独异的文学想象。

显然,这是一种以“乡土中国”作为视角与方法的文学研究,一种揭示乡土中国独异的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也是对“中国问题”的一种“中国文学阐释”。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五四现代思潮对乡土中国农民问题的思考	1
第一节 晚清改良文化思潮对中国农民的思考	2
第二节 白话文运动的农民大众“接受指向”	5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与“劳工神圣”思潮	8
第四节 歌谣运动与“新悯农诗”	12
第二章 启蒙思想与童年生命体验视阈下鲁迅农民 观及其审美想象	21
第一节 鲁迅启蒙思想视阈下的农民观	23
第二节 俄罗斯文学:鲁迅建构农民形象的思想资源	31
第三节 “病中国”的“中国病人”病象与根源	35
第四节 童年生命体验视阈与“桃花源”纯朴农民形象	45
第三章 文化人类学视阈下沈从文的农民观及其“湘西世界”	57
第一节 湘西,沈从文想象农民的“文化人类学”地理	59
第二节 文化人类学思想与沈从文的苗族农民形象书写	63
第三节 “湘西世界”农村女子形象的多重内涵	69
第四节 “湘西世界”农民形象变迁与沈从文“孤独” 的文化理想	82

第四章 二十年代文化政治力量对中国农民的多维认

知与审美思考	93
第一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乡土中国农民 问题的认识	94
第二节 《中国农民》:各种政治力量对乡土中国 农民问题的思考	104
第三节 “农民艺术”:乡土中国对作家的现代性 审美召唤	114
第四节 “乡土中国”的变迁与阶级性审美理念的 诞生	119

第五章 阶级视阈下左翼作家的农民观与走向觉醒的农民

第一节 茅盾“农村三部曲”:在愚昧与觉醒之间 挣扎的农民	126
第二节 洪深“农村三部曲”:李全生形象的 过渡意义	133
第三节 叶紫《丰收》:走向觉醒与反抗的农民	138
第四节 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阶级意识觉醒的农 民革命者群体	144

第六章 救亡视阈下东北作家群的农民观与“地之子”的

双重觉醒	153
第一节 刺刀下被迫觉醒的奴隶:李辉英的农民观 及其审美想象	155
第二节 “生死场”“猪狗”的精神觉醒:萧红的农民观 及其审美想象	164
第三节 走上抗争之路的奴隶:萧军的农民观 及其审美想象	174
第四节 地之子的“力”之美:端木蕻良的农民观 及其审美想象	188

第七章 解放区新意识形态的形成与翻身农民新形 象的塑造	207
第一节 “野百合花”的凋零	208
第二节 “工农兵方向”:想象农民的新意识形态	216
第三节 翻身农民复杂心态的审美书写	226
第四节 是被动翻身还是主动翻身:关于翻身农民 主体意识的思考	235
第八章 赵树理“为农民写作”文学观与新乡村政治生态 的审美思考	245
第一节 大众化运动与赵树理“为农民写作”的农民 文学观	245
第二节 《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对翻身农民形象的喜 剧性想象	253
第三节 《李有才板话》:赵树理对新乡村政治生态的 深远思考	259
第九章 从被侮辱被损害者到革命英雄:女性农民形象的 审美嬗变	267
第一节 梅春姐:一个夭折的女性革命者的精神寓言	268
第二节 金枝:女性低矮的天空和对自由的多元探寻	273
第三节 杨小梅:“新儿女英雄传”的革命传奇与双重 解放	280
参考文献	293
后 记	303

第一章

五四现代思潮对乡土中国农民问题的思考

西方国家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封建帝国大门，中国被迫开启了现代化历史进程。鸦片战争失败后，惊诧、失望的情绪弥漫于思想界，士大夫中间形成了一股“筹制夷之策”的改良文化思潮。^①

作为一名具有先知先觉意识的知识分子，龚自珍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并尖锐指出“一祖之法无不弊”，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据此，他在政治上为病症严重的大清帝国开出了修改封建礼仪制度、“变通”科举制度等改革主张的一剂性质温和的中药。魏源是针对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坚船利炮、封建中国武器落后挨打的世局，编写《海国图志》，为被动挨打的中国开出了一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补药，希望“力挽狂澜于既倒”。魏源大胆地放眼世界，“师夷长技”，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驱。魏源、龚自珍等人的变通改良思想直接孕育了以军事自强、富国利民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事实上，仅仅进行器物层面的改革，是无法改变晚清中国衰败命运的。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却直接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道路，造就了一大批直接接触西方先进文化知识典籍的、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严复正是这批知识分子的代表，在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

^① 梁启超曾高度评价龚自珍、魏源的主张变革的现代性思想，视之为中国现代性思想的源头。他说：“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见《梁启超全集》第三卷《新民说》，北京出版社，1997 年 7 月第 1 版，第 615 页。

他开始了对乡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代性思考。

第一节 晚清改良文化思潮对中国农民的思考

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政论文,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传播现代新思想。在《论世变之亟》中,严复开篇就否定了传统思想文化在世变之局中的适应能力。严复认识到西方富强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之间的深刻联系,近代化转换是包括工业化、民主化及国民文化心理改造三方面的复杂的社会转型。他反对脱离文化意识变革单纯追求经济、军事的近代化,意识到了所面临的思想文化启蒙和进行政体革新的历史课题。

可贵的是,严复把思想文化启蒙的路径与对象指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即“生民”,使“民”自由,获得现代民主意识。泱泱中华之所以衰落、失败,根源就在于“民”的奴性,“民”的愚昧、不自由存在状态。“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隶待吾民。虽有原省,原省此奴隶而已矣,虽有燠咻,燠咻此奴隶而已矣。夫上既以奴隶待民,则民亦以奴隶自待。”^①严复从中国封建社会秦朝对农民的愚民政策、奴役统治谈起,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大众的长达千年之久的被奴役统治和因此而带来的农民心理内化了的奴隶意识。对此,严复提出了著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学说:

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②

严复在《原强》中根据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生物社会学,将国

① 严复:《严复选集》,周振甫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34页。

② 严复:《严复选集》,周振甫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9页。

家盛衰强弱归结为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因此,他大声疾呼,中国要免于为达尔文之理言中的命运,必须施斯宾塞之术,致力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的“三民”说和译著《天演论》对当时的思想风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后来康有为、梁启超推行的戊戌变法及 20 世纪初的辛亥革命,都可以看出严复思想的深刻烙印。^①

1895 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严复发表政论后不久,康有为、梁启超等学子在京城发起了“公车上书”运动。这是对洋务运动的器物层面改革、对战争失败进行反思的一种集体表达。维新派提出了比龚自珍、魏源及洋务派更为根本的“君主立宪”制度改良的现代化道路。

1898 年,由康、梁推动的戊戌变法流血失败。至此,1840 年以来,从由地主、贵族、官僚、知识精英等上层阶级推动的从器物层面“制夷”的洋务运动、以“生民”为指向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文化启蒙,到推行专制体制改良的“戊戌变法”,这些上层温和改良路线都遭到了失败。戊戌变法失败后,以逃亡到日本的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又开始了新的探索。

百日维新变法的失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思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新起点。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意识到仅仅依靠上层官僚体制的改革在一个封建势力浓厚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梁启超继承并展开了严复在《原强》中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三大改造中国民众命题,在严复、林纾、康有为等人倡导“说部”主张的启发下,借鉴欧洲、日本政治小说变革社会、唤醒国民的启蒙作用,发表了《新民议》、《新民说》等,提出了以小说“新民”的现代性思想启蒙路线。

1902 年,梁启超在《新民议》序论中开宗明义,认为挽救沉疴中国的根本之道不是洋务运动开展的“实事”,而应该首先寻找救国的“理论”之道,“要在改良人格,增上人道”,即“新民”为“今日最切要之问题”,为解救衰亡中国的根本途径。“新民”理论在《新民说》中做了

① “海禁既开,译事萌蘖。游学欧、美者,亦以百数,然无分毫影响于学界。惟候官严几道复,译赫胥黎《天演论》、亚丹斯密《原富》等书,大苏润思想界。十年来思想之丕变,严氏大有力焉。”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三卷《新民说》,北京出版社,1997 年 7 月第 1 版,第 619 页。

进一步发展。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详细阐明了“新民”与国家的关系,言明“新民”作为国家民主政治之本的决定性作用:

“……然则苟有新民,何思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大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暗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①

梁启超的《新民说》对社会有机体说的引用,与严复几乎如出一辙。既然一国之盛衰强弱系于国民的素质,故他们均认为中国衰败的根源在于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梁启超还提出了“新民”的具体途径——“小说”,以新“小说”来唤醒民众,祛除奴性,“新民”救国。他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里,以其宏阔、宽广的思想视野不仅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影响世界进程的学术新说,如哥白尼的天文学,培根、笛卡儿的哲学,孟德斯鸠、卢梭的法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进行介绍,而且对“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的“诚恳之气,情高之思,美妙之文”大加颂扬,举出富禄特尔、托尔斯泰等小说作家对法国、俄国的社会及其国民思想改造的巨大作用。其后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不仅大气磅礴地鲜明提出“小说”可以用来“新民”的巨大思想启蒙作用,而且第一个从理论的深度阐释“小说”的文学功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②

梁启超指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对具有“支配人道”的巨大思想启蒙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小说所具有的熏、浸、刺、提四种力。因此,梁启超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一个现代性的新小说时代已经呼之欲出了!

1902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民说”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

①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655页。

②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615页。